

两浙作家文丛

张可久集校注



张可久集校注



(浙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 徐元 陈庆惠

封面设计 池长尧

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

张可久集校注

(元) 张可久 著
吕薇芬、杨 镰 校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41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496000 印数00001~1800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8-287-6/I·165 定 价：28.00 元

前 言

张久可(约一二八〇——一三四九以后)字可久，号小山，以字行。庆元(今浙江宁波)人。他虽是元代重要散曲作家，但一生沉抑下僚，生平事迹隐而不显，仅一鳞半爪略见于典籍，只能以此作为搜寻之线索。对于张可久生平的考索，孙楷第先生《元曲家考略》首建功劳，继后罗杭烈、杨镰、宁希元等先生的文章，又将此成果扩大^{〔一〕}。至今，其名、字、号，生卒年，以及仕历中的一些问题已有定论，当然，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商榷。我们在校勘张可久作品并搜寻有关材料时，也有一些新的收获，但愿我们的研究能对张可久的研究，乃至元代散曲的研究有所裨益。

一

最早较全面地记载张氏生平资料的典籍，乃是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，虽仅寥寥数语，但其所言里籍、仕历，已为世人所共识，因其乃当时记载，较为可靠之故。但因此书流传版本不同，对张可久之名、字，产生异说。明《说集》本以为张氏名「久可」，其余各书则皆作名「可久」。嗣后，明

清人又有不同说法。明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卷七十一云：「张伯远，字可久，号小山。」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存目，《张小山小令》提要云：「张可久，字仲远，号小山。」清人董沛《甬上宋元诗略》卷十四收有可久诗，其小传云：「张可久，一名大可，字伯远，号小山。官路吏转首领。著有《小山小令》。」综上所述，张氏之名有「可久」、「久可」、「伯远」、「大可」说；字有「可久」、「小山」、「伯远」、「仲远」等说。

众说之中，除《录鬼簿》一直为世人重视外，《尧山堂外纪》「名伯远、字可久，号小山」一说，影响颇大。不但在小传中作如是说，并且还引可久《沉醉东风》小令，谓「张伯远九月九日见桃花，作小令」，言之凿凿，极为肯定。此后，朱彝尊《词综》、《御选历代诗余》、袁陶轩《四明近体乐府》、董沛《甬上宋元诗略》、张宗橐《词林纪事》等书，均沿此说，但改作「字伯远」，盖因「伯远」类字不类名之故。近人任讷辑《小山乐府》时，在「诸家评论」中引蒋一葵此说，并加按语，「《元音》有张伯远《和祝直清》五古一首，不知即小山作否？」对此已存怀疑。据我们考察，蒋一葵此说实误。元代诗人张立仁，字伯远，号楚间，并有诗集行于世，惜早散佚，顾嗣立《元诗选》也未收入。元人李存《仲公集》卷二十有《张伯远诗集序》，序中说：「仆儿时闻诸父间，言伯远能诗，……其仲子所辑所为诗若干卷，传之四方。……伯远姓张，讳立仁，世为鄱阳诗书家云。」其诗今散见于他集中。任讷所引《和祝直清》即是其一。可见张伯远另有其人，并非可久。元人蒋昌辑《元风雅》卷二十八列「张可久」，卷三十列「张伯远」，也可知元人文献

中，并未将二人混作一人。看来是因为「可久」与「伯远」意义相关，而且二人皆「老死丘壑而无所遇」（李存《仲公集》），其境遇又相同，后人才混作一人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张可久「字仲远」，却不知其据。但其所存目《张小山小令》二卷（江苏巡抚采进本）却是「明初宋濂得其词半册于礼贤馆，后方孝孺又购得钞本一帙以示濂，乃参互校正，分为上下卷，镂版行世」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。应是可靠版本。「总目」对版本叙述较详，估计此书有序。可久的字或是据「序」。宋、方二人离元季时代较近，又都是大家，若此，则必有所据。惜此书未曾得见，不知其详，特此存疑。

其实，小山名，字究竟为何，元人集中早有记载，元人郑玉《师山集》卷四《修复任公祠记》中有「四明张久可久监税松源，力赞其成」一语^{〔二〕}，道出了小山名久可，字可久的事实。此外尚有三则材料可证其可靠性。一是上所引《说集》本《录鬼簿》中所记小山名为「久可」。《说集》本在今存《录鬼簿》版本中，年代较早，应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因曲家常以字行，则别本作名「可久」也可以理解。其二，天一阁藏《小山乐府》最后一则小山自作之跋语，署为「至正丁亥良月张久可书」。其三，清人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三十二著录有「张久可《张小山小令》二卷」，其名也为「张久可」。可见张氏名「久可」的说法，由来已久，也并非新发现，但一直被人们所忽略。

此外小山还有名「大可」、「九可」之说。清董沛《甬上宋元诗略》卷十四，收小山诗《题赵孟頫饮马图》（诗出于清人高士奇《江村销夏录》卷一）题名「张大可」，小传中也说：「一名大

可。」此误很可能源自天一阁旧藏《小山乐府》，小山自作的跋语，署名潦草，「久可」形似「大可」，我们目睹此原件，深为理解。「九可」则出自《玉山名胜集》，中收可久之诗，署名为「久可」，而别本署为「九可」，当是音误。

明《说集》本及曹本《录鬼簿》以为「小山」为张氏的字，清人袁陶轩《四明近体乐府》则以「字伯远，一字小山」。除此外，则陈焯《宋元诗会》、董沛《甬上宋元诗略》、朱彝尊《词综》、张宗楠《词林纪事》、庸世臣补辑《元诗选癸集》皆以「小山」为号。既然《师山集》以「可久」为字，已无疑问，则「小山」应是号。古人常据本名涵义另立表字，「小山」与「久可」却并不相关，「小山」为号恐无疑问，当是钦佩晏小山而以此为号。然而，袁陶轩《四明近体乐府》卷七引《西庐词话》为据，指出：「小山在（庆元）城北隅，倪氏有园庭极盛。伯远（指可久）以小山自号，当必城北人。」此说晚出，当否尚难判定，此备一说。

可久之生卒年虽不能确定，经考证已知其大约。《录鬼簿》将他列为「方今才人相知者」，可久又称马致远为先辈，知他为元后期作家。其生年之最可靠证据为天一阁旧藏影抄本《小山乐府》中贯云石为其所写之序文，此序作于延祐己未（六年，一三一九）。序中说：「小山以儒家读书万卷，四十犹未遇。」〔三〕四十为约数，则小山生年当在二二八〇年左右。

考小山生卒年，元人李祁《云阳集》卷四《跋贺元忠遗墨卷后》一文，最为重要，此文首先由孙楷第《元曲家考略》引证。其文谓：「因记余在浙省时，领省檄督事昆山，坐驿舍中。张率数吏

来谒。一见问姓名，乃知其为小山也。时年已七十，匿其年数，为昆山幕僚。遂与坐谈笑，仍数数来驿中语，数日乃别。别时，复书其新诗十余首来。」这是一则记载可久晚年行踪的重要材料。要知可久的生卒年，就需知李祁何时与可久见面。

李祁，茶陵州人。元统元年（一三三二）左榜进士第二，授应奉翰林文字，以母老就养江南，改婺源州同知，迁江浙儒学副提举。以母忧解职。孙楷第在《元曲家考略》中指出李于至正四年（一三四四）始任江浙儒学副提举。征引《金华黄先生文集》卷十《杭州路儒学兴造记》（至正七年著），文中说：「至正二年学斋毁于火。四年夏，儒学提举班公惟志俾执事者度木简材，而李君祁来为副提举，亟命学正录直学等揆日庀工。」孙楷第又说，今所见元官本《宋史》以至正六年刊于杭州者，其书前载中书省至正六年咨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文，以及行省提调官衔名，其儒学提调官中，有「承务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李祁」，可知李祁至正六年（一三四六）在官。孙楷第的考证给人以启发，据此，我们又从《云阳集》找到材料。《云阳集》卷九《书郝氏紫芝亭卷后》云：

至正丁亥（七年，一三四七）予添司江浙儒学提举，仲举（张翥）奉朝廷命来饯宋、金二史于杭，且命儒司官佐董其事，故予得与仲举同砚席起居者半年。后三年，予忧居姑苏，而仲举再奉旨祭神海上……

可知至正六年朝廷下令在杭州刊刻宋、金二史，张翥于七年抵抗，主持此事，与李祁「同视席起居半年」。「后三年」即至正十年（一三五〇）李祁丁母忧居姑苏。则李祁在昆山见到可久，必在至正十年之前。

上已引元人郑玉《师山集》卷四《修复任公祠记》，知张可久在新安城修复「任公祠」时，尚监税松源，而郑玉此文作于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，可知当时可久尚在松源任上。以此推断，李祁会见可久必在至正九年至十年间，上推生年，正与贯云石「序」所言璧合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资料也可证明可久生年。现存可久诗中，有《题顾仲瑛芝云堂》、《早起口占寄玉山（即顾仲瑛）》两首。顾仲瑛即元人顾瑛，号金粟道人，昆山人，家豪富，是江南著名文坛盟主。其居室玉山草堂，与倪瓒清閟阁齐名。据其自著「墓志铭」，说他年逾四十，在旧邸之西，重筑亭园，名「玉山佳处」，「芝云堂」乃其中一景。顾氏四十岁乃至正九年。元人郑元祐《侨吴集》卷十有《芝云堂记》记其事，此记作于「至正己丑（九年，一三四九）秋八月望日」。后芝云堂毁于火，所藏之书俱焚，谢应芳有七律一首《闻顾玉山芝云堂火而所藏之书俱焚，恐其不能为怀，寄诗释之》（《危巢集》卷三），此乃后话。但当时芝云堂却是文士们经常聚会的地方。其「墓志铭」又说：「至正九年，江浙行省以海宇不宁，又辟贰昆山事，辞不获，仍以侄良佐代任焉。」则可久与顾瑛侄同衙共事，得与顾瑛来往，事也在至正九年以后。

可久卒年不得详知，从以上材料来看，必卒于至正十年以后。

宁希元《张可久生平事迹考略》用力甚多，给人很多启发，但也有些结论与我们意见相左，可久卒年即是其一。宁希元认为张可久卒于至正十四年（一三五四），现已有一些学者将此作为定论，故不能不辨。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元人倪瓒为所作《秋林野兴图》所写两则题识：

余既与小山作《秋林野兴图》，九月中，小山携以索题。忆八月望日，经锄斋前木犀盛开，因赋下韵。今年自春徂秋，无一日有好兴味，仅赋此一长句，录左方。（诗略）己卯秋九月十四日，云林生倪瓒。

又：

今年岁在甲午，冬十一月余旅泊甫里南渚。陆益德自吴淞归，携以相示。——盖藏于其友人黄君允中家。余一时戏写此图，距今十有六年矣。对之怅然。

（皆见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）

宁文以为此第二则题文，从语气来看，「自当作于可久卒后不久，故有物是人非、恍如隔世的感叹」。平心而论，此题文确有沧桑之叹，却无悼念之意，且连小山之名都未题及，无法作为可久卒年之确证。此画原应在小山手中，因而有第一则题词；然而十六年后，此画却藏于吴淞黄家，似早已不在小山处，故有一「藏」字。这期间存在多种可能：是小山转赠黄氏？或是小山宦途奔波，途

中遗落而入黄家？当然，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，即小山十分宝爱此画，随身携带，死后散落吴淞黄家。吴淞离昆山很近，若这种可能存在，小山倒有可能卒于昆山任上了。然而，若小山新亡，黄允中得此画，又由友人携至倪瓒处，必将小山亡故消息带去，倪、张二人是故友，不可能不提此事。那么题文中就不会仅仅有「对之怅然」四字了。所以小山卒于至正十四年只是猜测，不能作为定论。

二

关于张小山的经历仕途，四十岁之前不见有何种记载。贯云石延祐间为小山《今乐府》写的序文，乃是小山生平重要的材料，知他当时年约四十而未遇，但散曲创作却已颇有成就。小山虽是庆元人，但他作品中却无描写甬上风物的篇制，或许庆元只是祖籍，已无产业，也无亲属。

从他的散曲作品中可以知道他曾客居平江路吴江、苏州、吴淞一带。宁希元文章中举小山《中吕·红绣鞋·宁元帅席上》，从而考证他客居吴江是在青年时期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宁元帅即宁玉（二二三六——一三〇二），孟州河阳人。《新元史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皆有传。中统元年为河道官，后从伯颜伐宋，以功除管军千户，佩金符。后迁管军总管，擢浙西道吴江长桥都元帅兼沿海上万户。至元二十三年以病乞归。未几，朝廷令玉从镇南王讨交趾，师至安南，玉病甚，以子居仁代，遂归至吴江，大德六年（一三〇二）卒。据此，小山这一小令必作于大德六年之前，当时可久年仅二十挂

零，小令中有「少年谁识故侯家」句，也可为证。

小山另有《双调·折桂令·疏斋学士自长沙归》，中有「望仙华十二芙蓉，夜醉长沙，晓过吴淞」句，可证明他曾客居平江路。今可考知此曲作于何年。卢挚是元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，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散曲作家。约生于一二四二年左右，卒于一三一五年以后（五），曾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等职，以集贤学士出为岭北湖南道廉访使，拜翰林学士，迁承旨。可久此曲当是卢挚自长沙绕道吴淞等地，入朝为翰林时，为欢迎卢挚而作。吴澄有《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》一文，云「卢公由集贤出持宪湖南，由湖南复入为翰林学士」。与可久曲中「夜醉长沙，晓过吴淞」句合，当无误。

那么，卢挚是哪年进京的呢？危素《临川吴文正公年谱》记：「大德七年（一二三〇）癸卯春，（吴澄，即文正公自京师）治归，五月己酉至扬州。……淮东宣慰使珊竹公玠，工部侍郎贾公钧，湖广廉访使卢公挚……具疏致币率弟子致扬州，请公讲学。」则知大德七年卢挚仍在湖南任上。

又，《元文类》收卢挚《东宫正殿上梁文》，中有「玉册金文，既正重黎之位，桂宫兰殿，载新游震之居」，乃指太子新立之事。据《元史·成宗纪四》知大德九年，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，诏告天下。为使太子有「师宾接见之所」（卢挚《东宫正殿上梁文》），于是大兴土木，修东宫正殿。以此，该文应作于大德九年，则卢挚入朝乃大德八年。小山小令中有「鹤唳黄昏半空，雁来红叶西风」句，时令乃在秋季。小山大德八年和平江路由此可证。

卢挚从长沙入京，自可由陆路经湖北、河南抵京，改走水路经吴淞入京乃是绕远，目的可能是一游吴地。小山作品题为《疏斋学士自长沙归》，一「归」字值得玩味。卢挚曾任江东道宪使，江东与平江同属江浙行省，故有此「归」字。小山自是以江浙行省臣民自居。值得考虑的是，小山当年才二十挂零，却能与宁玉、卢挚等元帅、宪使来往，很是难得。若不是在衙门当差，必得有势力者援引不可。但小山一生坎坷，似无此援手。他晚年有小令《水仙子·归兴》写道：「淡文章不到紫薇郎，小根脚难登白玉堂，远功名却怕黄茅瘴。」很准确地道出他一生遭际。因此他青年时曾在平江路某衙门当过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小山与卢挚的一段交往，对他的一生具有很大影响，很有必要作一番探究。今存小山散曲中，与卢挚有关的作品共八首。但这八首小令却并非作于同一时间。上述《疏斋学士自长沙归》写在秋天，而《折桂令·湖上怀古次疏斋学士韵》（中有「趁夜雪归鸿，暮苑啼鸦」句）、《红梅次疏斋学士韵》（有「快传语花神，换却南枝」句）、《和疏斋学士韵》（有「爱疏翁不放春闲，……花老南枝，雪深西圃」句），可知时令在冬春之交；还有一首《小桃红·忆疏斋学士郊行》，所忆也是在这一时令，与卢挚在西湖游赏的往事。大德八年秋卢挚绕道上来江浙一带，不可能逗留到冬、春之交，可见小山与卢挚的交往不止一次。那么小山与卢挚在大德八年后仍有过交往。

松泉老人《墨缘汇观录》卷二，著录唐欧阳询《化度寺塔铭册》，上有元、明诸名家题识，其中有：「元大德间高翁卢挚，太原刘致时中，醴陵李应实仲仁观于宣城寓居之疏斋。」证明了卢挚

后来曾寓居宣城，时间自是在大德九年之后。

卢摯在至大二年（一三〇九）作有《三皇庙碑》（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七七〇）。「潭郡」于至大元年初始修复「三皇庙」，于至大二年春建成。碑文中说道，庙成之后，湖南「宣、宪两府书其事，俾以宣属吴掾思义来宣请记」，卢摯因请而成此文，可见卢摯至大二年春寓居宣城。又，卢摯有小令《蟾宫曲·肃政黎公庚戌除夜得孙，翌日见招，作此以贺》，中有「快传语江东缙绅，胜歌谣天上麒麟」句，不用细考，此肃政黎公必是江东道廉访使。庚戌即至大三年，即撰《三皇庙碑》次年，「翌日」则已是至大四年的新年了。

又，据《元史·揭傒斯传》记载：「延祐初，（程）矩夫，（卢）摯列荐于朝（荐揭），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」则卢摯延祐初又返京为官。他官至翰林承旨，此次进京可能拜此官职。另，卢摯有小令《沉醉东风·举子》也值得注意。仁宗于皇庆二年（一三一三）下诏重开科举，三年，天下郡县「举其贤者、能者，充赋有司」。（皇庆三年即改元为延祐元年）延祐二年（一三一五）各地举子会试京师，三月廷试，四月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。又因是「重开科举」，故破格降恩，赐会试举子七十以上从七品流官致仕，六十以上府、州教授，其余皆山长、学正等官。京城盛况空前。卢摯应是目睹此盛况而写《举子》小令，也可证明他延祐初已在京。

卢摯行踪既明，我们便可以推断，至大间小山与他又有交往。小山小令中所涉及地点，多在杭州，故可能是卢摯寓居宣城期间曾游杭州，才与小山有多首唱和之曲。另外，小山还有一次与疏斋

共游茅山的经历，写出了《红绣鞋·茅山疏翁索赋》。我们考证卢挚与小山的交谊，是为了寻找小山的踪迹，至此我们可以说，至大年间小山大约生活在杭州。也可能正在这段时间内，小山与马致远结交。马有《湘妃怨·和卢疏斋西湖》四首，可久有《庆东原·和马致远先辈韵》九首，似都作于此时。

小山与刘致的交往大约也始于此时。关于刘致的生平，学者们考证颇多，并有不同看法，主要分歧在太原刘致（或以为石州宁乡人）与古洪刘时中是否一人。我们认为并非一人。刘知渐《元曲家刘时中研究中的问题》（《重庆师院学报》一九八九年第四期）说元代至少有五个刘时中，考据甚确。而与张可久交往的是太原刘致时中，曾为可久写过《吴盐》的序。这个刘致于大德二年于长沙拜会姚燧，受姚赏识，后推荐给新任湖南宪使的卢挚，用于幕府。有这一层关系就不难理解卢挚曾与刘致在宣城寓所共观《化度寺塔铭册》了。据《姚燧年谱》记载，姚于至大四年七月至杭州，刘致随侍，并有《山坡羊·侍牧庵先生西湖夜饮》等作品问世。小山与刘致的唱和之作，也当有一部分作于此时。刘致于至治二年，由河南掾进京任太常博士、翰林待制。据刘知渐文考证，他至顺三年犹在京，则任江浙行省都事必在至顺三年之后，那时小山与他又有交往。

小山在至大、延祐间与贯云石结识，这又是他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又是小山的创作旺季，他将自己的作品编纂成册，名为《今乐府》，请贯云石为他写了序。序言开篇即云：「余寓武林，小山以乐府示余……」序写于延祐六年（一三一九），知小山延祐间在杭州。张、贯二

人唱和之作大部分与西湖有关，说明当时二人共游西湖，志趣相同，游兴正浓，交往日深。酸斋说小山「四十犹未遇」，是指他不受重用，却不能认为小山四十前肯定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。小山《金字经·次韵》中说：「出岫白云笑，入山明月愁，两字功名四十秋。」看来他确实曾为「功名」奋斗过，只是未遇伯乐而已。酸斋与可久交谊较深，可惜泰定元年（一三二四）即已仙逝，未及对可久仕宦有所帮助。

可久似与西湖有不解之缘。贾仲明补《录鬼簿》吊词曰：「水光山色爱西湖，照耀乾坤《今乐府》」，《苏堤渔唱》文相助。又《吴盐》余意续，《新乐府》惊动林苏。荆山玉，合浦珠，压倒群儒。」正说明可久作品多半与杭州、西湖有关。元人张仲深有诗《题张小山君子亭》其诗曰：

我尝西湖谋卜居，前有水竹后芙蓉。罨红廉翠眩人目，云锦倒映青珊瑚。归来试问隐者庐，嘉葩美植同纷敷。彩鸾蹋空夜不啄，文鸳陨粉秋生珠。竹乘君子操，莲如君子清。我亭后其中，乐以君子名。道人寓物不着物，岂唯物美唯称德。满帘花气香馥馥，一亭翠景风泠泠。愿君志如莲，濯淤泥而不染，操如竹，拍霜雪而不零。我今闻之当乞盟，制荷为衣竹为策，迺谢法世全吾生。

张仲深字子渊，庆元人，是小山同乡。其诗集散见于《永乐大典》。清乾隆时编《四库全书》，便

于《永乐大典》中重辑《子渊诗集》六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「多与纳新（即乃贤）、杨维禎、张雨、危素、袁华、周焕文、韩性、乌本良斯道兄弟唱和之作，而纳新为尤夥。」其书有四则序文：（后）至元己卯（五年，一三三九）单弘序、至正十二年危素序、至正丙申（十六年，一三五六）三月郑奕夫序、同年三月杨彝序。视其成书较晚。他常与乃贤唱和，交谊较深，乃贤生于一三〇九年，子渊大约与乃贤年辈相仿，应较小山年辈为晚。从诗中可知小山在西湖边有房产，这是他一生中时隐生活中的一个落脚点。大德以后，至大、延祐间，小山有可能常住在那里。

读小山散曲，有一处不解，即他的四册散曲集，独《苏堤渔唱》作品最少，且只咏一地之景物。至此，不禁令人联想到他的隐居处是否离苏堤不远。作此猜测应该是有合理性的。

三

今可考证确定的，小山最早仕历，乃延祐末至至治、泰定年间曾任绍兴路吏。

可久有题为《客胡使君席上》、《胡容斋使君席间》、《别会稽胡使君》等小令。胡容斋即那台胡元。他曾于元英宗至治元年（一三二一）任绍兴路总管，泰定年间迁徽州路总管〔六〕，小山《普天乐·胡容斋使君席间》有「明月南楼，吹残碧玉箫」句，是以庾亮南楼咏月作为典故，点明自己属吏的身份。《落梅风·别会稽胡使君》写道：「锦云乡鉴湖宽似海，还不了五年诗债。」似又点出他在会稽五年。